



刘登阁◎著

中国历史大变局

纵览历史风云，品味元亡明兴。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元亡明兴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K247/11

2008



刘登阁◎著

中国历史大变局

纵览历史风云，品味元亡明兴。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元亡明兴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亡明兴：中国历史大变局/刘登阁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 - 7 - 5013 - 3553 - 4/K · 1559

I. 元… II. 刘…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元代
②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明代 IV. K247. 07 K24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2167 号

书名 元亡明兴：中国历史大变局
著者 刘登阁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 gov. cn (投稿) btsfxb@nlc.gov. cn (邮购)

Websit www. nlcpress.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5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553 - 4/K · 1559

定价 29.00元

前 言

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莫过于元朝。从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自杀到1368年元顺帝被逐北逃，这个威加四海、纵横欧亚的帝国统治中原仅仅90年。如果从忽必烈定国号算起，也只历11帝，凡98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至多历15帝，163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居中国各朝之冠。

从军事上来说，元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没有外患，反而是所有的邻居都害怕这个“巨无霸”；从经济和科技上说，广袤的疆土被开垦，棉花、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矿业、手工业发达，纸币得到广泛的应用，出现了郭守敬、黄道婆这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物；从文化上来说，元朝的戏曲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一道文化高峰；从社会控制来说，元朝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相比以前朝代的“王权不下县”，元朝把统治权威延伸到最基层，50户为一社，社长由统治者信任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并摧毁民间一切可能反抗的资源，如五户合用一把菜刀，民间不能拥有马匹等等。乍看起来，以元朝国力之强盛，社会控制之严密，应当江山永固，可是为什么不到百年而亡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几乎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上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但到中期战事就已完全平息。因此，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不是因为外患，而是内忧。由于元末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加之内部治理不善、备受非议的等级制度，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天灾人祸，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崩溃，更成为广大农民



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于是，元朝便不可避免地、过早地崩溃了。

因此，虽然近年来关于秦朝、清朝的争论似有超越之势，但最能让人提起争论兴趣的，还是这个建立起空前疆域，综合了民族、经济、文化以及世界格局的所有可以挑动人神经话题的元朝。要么说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是中国走向没落的起点；要么说其是中华民族空前融合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开始。

而在国际上，伊懋可于1973年提出了“14世纪转折点”的论点，认为在14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开始发生改变（或者说长期运作的因果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了中古经济活力的消失。

伊懋可的这个著名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见解，而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见解。1973年以后，许多学者仍然表露出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并未读过伊懋可的著作。如傅衣凌就认为在14世纪以前，中国的“生产力是走在世界前头的”，而到15、16世纪，却变成了落后国家。漆侠则认为宋代中国经济“居于世界的最前列”，但在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逆转”，因此从14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逐渐地缓慢、迟滞下来”。可见，这种“转折”说，确实是大多数史家的共识。

支持“转折”论的学者指出：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的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此后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与以前相比出现重大差异，因此形成“转折”。具体地说，就是经过这个“转折”，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变成了“明清停滞”。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从14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文艺复兴高举着人文主义大旗，大力标榜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摈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群星争艳、人才济济的光辉时代，也是西方如朝阳般冉冉升起，而东方步入日暮黄昏的时代。原本在

技术上落后东方两千年的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洗礼以后，突然一跃而起，跨上社会历史发展的快车道，迅速赶上并超过了东方，并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于到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也造成国人长时间以来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因此，这一时期对于东西方来说，有着不同的心境，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从此，世界的东方化时代结束了，东方开始由盛而衰，甚至东方也开始走向了西方化。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代元而兴的明朝总体上是一个收缩保守的朝代。因为13-14世纪蒙古征服对西方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西方文明幸免于难，中国则险些招致“悉空其地以为牧场”的灭族之灾。蒙古骑兵打通了世界，不仅从波兰草原到西伯利亚、哈刺和林、北京的陆上丝绸之路全线畅通，而且从地中海到巴士拉、马拉巴尔、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一帆风顺。

但这个世界交通的伟大时代，带给中国与西方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确切地说，丝绸之路不是中国通向世界之路，而是世界涌入中国之路。西方人可以作为色目人随着蒙古大军进入中国，像马可·波罗那样为元朝大汗当差，发财致富，而中国人作为被征服者则只能守在家乡备受外族入侵者的奴役与掠夺。因此，丝绸之路对西方来说是贸易之路、财富之路，对中国来说则是入侵之路、贫困之路。在丝绸之路上，西方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流向东方，中国的财富、技术流向西方。西方人在这条路的尽头看到的是诱人的希望，中国人在这条路上看到的则是可怕的劫难。蒙古大军为西方打开了世界，却为中国关闭了世界。

因此，明朝驱逐外夷，重建汉族政权后，封闭保守是必然的，有着充分的历史缘由。开放没有必要，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充分自足，整个外部世界，从印度到欧洲，不论经济技术还是制度思想，都不能给中国提供借鉴。更何况元朝历史的经验告诉中国人，开放意味着民族奴役、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明朝收复华夏旧地，作为统一的汉



族政权，它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固守祖先的江山，驱逐外夷，恢复中华帝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实力。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内陆帝国，持续的地理扩张在四方已达到极限，几千年之间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袭，如今固守住内陆，坚实的泥土与岩石才是帝国的基础。开放与扩张，既无政治必要，也无经济利益。这就是说，明朝政治经济趋向封闭内敛，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对内实行海禁，对外“永不征伐”，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的祖训。此后的郑和下西洋，正值中华帝国进入全面收敛期，在整体的下落趋势中，扩张和远航无疑属于一种非常情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的疯狂。相比之下，停止下西洋却在情理之中，是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的。

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史实和现象，有美好、丑陋的区别，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之分，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简单地对此肯定或否定，要理性地说明：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种状态？它的正面意义、负面作用又表现在哪里？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对照现在。不要将灾难忘得太快，更不要充当历史的麻木看客。

目 录

前言	(1)
一、衰世之相	(1)
1. 天灾乎? 天命乎?	(1)
2. 丞相造假钞与以钞买钞	(6)
3. 苛政猛于虎	(13)
4. 佞佛滥施结恶果	(18)
二、马背治国	(23)
1. 偃文倡武	(23)
2. 民怨沸腾的火山	(31)
3. 豺狼当道,莫问狐狸	(36)
4. 汉化与反汉化的龙争虎斗	(43)
三、亡国之音	(50)
1. 血腥与阴谋: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	(50)
2. 两都夺位之战	(57)
3. 强枝弱干:皇帝与权臣斗法	(63)
4. 风雨飘摇中的末代皇位	(69)
四、乱世英雄	(80)
1. 满城尽带红巾甲	(80)
2. 红巾军北伐	(88)
3. 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	(95)
4. 方国珍横行海上	(102)
5. 张士诚自立吴王	(109)
五、崛起草泽	(116)
1. 朱元璋:英雄不怕出身低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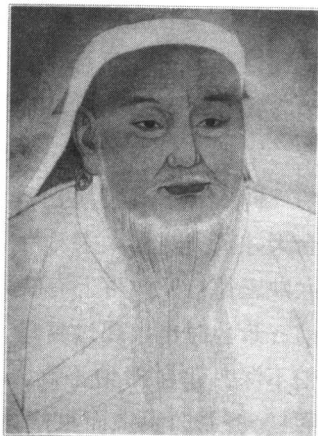


2. 崭露头角·····	(123)
3. 燎原之势·····	(129)
4. 攻取应天·····	(134)
六、成王败寇 ·····	(143)
1. 火烧陈友谅·····	(143)
2. 围堵张士诚·····	(150)
3. 降服方国珍·····	(161)
4. 消灭陈友定·····	(166)
5. 北伐胜利·····	(169)
6. 明太祖登基·····	(180)
七、成事方略 ·····	(183)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183)
2. 得人才者成大业·····	(188)
3. 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194)
八、立章建制 ·····	(204)
1. 巩固君主专制集权·····	(204)
2. 整顿吏治与严惩贪腐·····	(208)
3. 宽仁惠民·····	(217)
4. 制定礼仪制度与简化公文·····	(222)
5. 完善科举考试·····	(226)
6. 严禁宦官干政·····	(232)
九、大明之威 ·····	(237)
1. 大杀功臣:拔除权杖棘刺·····	(237)
2. 大兴文字狱与加强文化专制·····	(247)
3. 锦衣卫与特务政治·····	(252)
4. 靖难之战·····	(256)
5. 永乐王朝·····	(264)
明朝的光荣与梦想(代结束语) ·····	(270)

一、衰世之相

1. 天灾乎？天命乎？

中国历代皇帝都喜欢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靠的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王朝更替更是“天意”所为，“苟有代谢，非人事也”。从成汤代夏桀、周文王兴起代殷纣王，到刘邦以一介布衣之身起义灭暴秦、李氏大唐取代无道之隋、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北宋，一直到成吉思汗得金国基业，建立蒙古帝国，都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睹到天命论闪转腾跃的身影。成吉思汗当年也正是靠着萨满首领通人巫阔阔出等人的天命论舆论登上汗位的，他自称“天命众百姓都归我管”，天神命自己“为普世之君主”。



成吉思汗像

既然君王受命于天，一旦君王不能顺天意而行，有了错误和过失，那么上天就会以怪异的天象和异常的天灾来给予警示和谴责。所以自古以来明君都非常重视“天意”。如果上天示警，帝王会斋戒、素服、废乐、祭天等，更要自责反省，“视天时而布政令”，“察灾祥而省得失”，还要进行大赦、求直言等。

汉文帝二年11月末发生了日食，12月15日又发生了日食。文帝为此下“罪己诏”：“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抚育治理他们。如果



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会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11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抚育百姓，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食，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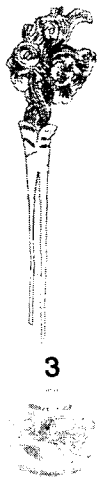
唐贞观八年，山东及江、淮经常发大水。唐太宗问侍臣原因，秘书监虞世南说：“山东的雨阴时间太久，这恐怕是有冤狱，应当反省囚禁方面的政策，这或许是天意。而且灾异不能胜过德行，修德可以消除灾变。”太宗对此非常重视，派遣使者救济饥荒，审理冤屈的案件，多加谅解赦罪。



忽必烈像

同一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长六丈，历经百余天才消失。唐太宗对侍臣说：“天见彗星，是因为朕缺乏德行，政事上有缺失，才出现这样反常怪异之事？”虞世南说：“以前齐景公时也出现过彗星，齐景公问晏子原因。晏子说：‘主公你挖池沼怕不深，建台榭怕不高，施刑罚怕不重，所以天见彗星，这是警戒主公啊！’齐景公畏惧而重修德政，结果十六天后彗星就没有了。陛下如果不修德政，就算经常出现麒麟凤凰，最终也是没有好事的。只要为政没有失误，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变，在盛德之下也不会造成灾害。希望陛下不要以功高古人而骄矜尊大，不要以为太平长久就骄纵放肆，如果能始终如一，彗星出现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幸好没有齐景公的过失。但朕从18岁起便治理国家，北灭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24岁时天下安定，29岁时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太平安定，颇有点自负之意，这是我的错误啊。上天出现异变，正是因为这个吗？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骄傲放纵，一朝而败，我怎么能自己也骄傲呢？自己不由得不能



惕、震惊呀！”魏征说：“臣听说自古帝王没有没遇到灾变的，但如果能修德政，灾变就会自行消失。陛下因为天有异变，随即能够戒惧，反复思量，深刻自责反省，虽然有异变，也必定不会成为灾祸。”

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元朝可能从一建立就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垂青，或者说，至少不像成吉思汗所标榜的那样是什么“天命所归”，而是有着摆不脱的“原罪”，因为元代可以说是灾荒的朝代，元代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历史所罕见。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也许是“上天示警”，也许是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14世纪前半期，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末顺帝时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而天灾人祸正扮演了一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角色。

据记载，元代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513次。据史书记载，元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自元世祖1271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亡的98年间，共有52个年份发生轻重不同的水灾，水灾年份占元代总年份的53%；而旱灾占23个年份，为总年份的24%；地震年份约占18%。别的地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301年，从北方的汴梁、归德、南阳到南方的高邮、扬州、常州多处地方发生蝗灾。而峡州、随州、荆州、秦州、扬州、滁州、高邮等地还连降暴雨，发生洪涝灾害。河南大部发生旱灾；山东、河北一带则发生水灾。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很多区域成了“千里为虚，荆棘没人”的荒凉无人之境。元杂剧《陈州崇米》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灾荒年景：“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几致相食。”

元仁宗时，岭北遭遇罕见的天灾，下雪深达丈余，人畜被淹没。穷苦牧民被迫出卖妻儿换取粮食求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通往和林的路上，到处都是死尸。驻守北边的士卒，常常因官吏克扣军饷，衣食无着。对元朝统治者的愤懑，在天灾之年集中爆发了。岭北的驻军和晋王也孙铁木儿的部民纷纷起而暴动。由于他们未能互相配合，很快就遭到元朝统治者的镇压。起义者或者被处死刑，或者被加罪杖罚流配到远方。

元末，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属水灾。据《元史·王行志》等书记载，

元末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元顺帝元统元年、二年，京畿、潮州、济宁、曹州、东平、山阳等地均河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和屋舍，人们无粮可食，无家可归。

至元三年，绍兴、广西贺州、卫辉发大水，很多地方平地水深二丈余，淹没了人们的房舍、田地，人们只能爬到树木上休息，郡守和一些僧人只好乘着小船为他们送点吃的，将一些老弱病残者移居城头，很多地方一个多月以后大水才退。

至元四年，永丰、邵武再发大水，城市里到处洪流，沿河的民居完全浸泡于水中。至元五年，汀州路长汀县发大水，平地深三丈许，淹没民居八百家、民田二百顷，溺死了八千多人。以后几年更是洪灾不断。

元顺帝至正年间，即1341—1368年，全国各地水、旱、风、震、疫诸灾纷至沓来，人民无以为生。如至正元年，扬州、通州、泰州等州海潮涌溢，溺死一千六百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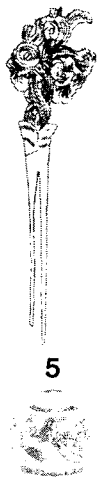
至正四年五月，由于连续二十多天大降暴雨，黄河暴涨，沿河一带均遭水患。大水淹没了庄稼，人们无粮可食，竟发生了“人相食”的悲剧。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广阔，是河患史上罕见的，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的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这年七月，温州飓风大作，发生海啸，民居尽毁，溺死者甚众。

至正八年正月，黄河再次决口，先是淹没济宁路，继而北侵安山，汇入运河，淹没济南、河间，不仅运河有中断之势，而且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有被淹没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河患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河南、山东等河泛区由于饥民猛增，所以强盗群起，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

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其中以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吴天保领导瑶民起义，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义，辽东女真人锁火奴和兀颜拨鲁欢反元，云南死可伐起义等影响最大。监察御史张楨惊呼：



元仁宗像



“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元史·顺帝纪四》）

1353、1354年，泉山大旱灾大饥疫，“种不入土”，五谷歉收，“饿殍载道”，“死者相枕藉”。慈善人赵深道会合僧众，造船通过城壕与八卦沟，进城拉运死者到郊外埋葬，每天都必须往返数次，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可是元朝统治者，仍然不顾百姓死活，拼命哄抬粮价，催税逼债。

因此，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的繁重；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统治者的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

除了水灾为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外，风霜雨雪在元代也是任意肆虐，如元统元年三月，绍兴萧山县大风夹杂着暴雨和冰雹，把树木连根拔出，将人们居住的房屋摧毁，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死于这场灾难。

1346年2月，兴国路下冰雹，大的像马的头，小的也像鸡蛋。五月，绛州下冰雹，大的有直径二尺多。1348年8月，益都临淄县下冰雹，大的像盆字，田野里连青草都被横扫一空。1347年8月，卫辉发生了严重的霜冻。1350年春，彰德快到清明节时，下了三尺深的大雪，很多老百姓都被冻死、饿死。1352年4月，彰德下冰雹，大的像斧头，当时小麦已熟等着收割，田野里被冰雹砸得像碾场，颗粒无收，树木都像被斧头劈开一样，死伤人、畜无数。

1358年8月，庆阳、延安、宁、安等地发生大规模野鼠啃噬庄稼灾害，往往几百亩庄稼一夜被毁坏一空。1366年，泗州淮河两岸，也发生了灰黑色田鼠傍晚出来，成群结队地吃庄稼情形。

元末还几乎年年发生蝗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先后发生了蝗灾。遮天蔽日的害虫仅仅几天的时间就将庄稼全部吃掉，饥饿的百姓只好捕捉蝗虫来充饥。他们还把一些蝗虫弄死后，晾干备食，等到这些虫干被吃光之后，就发生了“人相食”的悲剧，很多人都因饥饿而死。

元末大规模的瘟疫也爆发得相当频繁。如从至正四年到二十二年间，福州、邵武、延平、汀州、济南、德州、龙兴、黄州、饶州、莒州、汾

州、滕州、绍兴等地都发生过大的疫情。

元末地震和山崩活动也很频繁。从元统元年以至正十七年，巩昌、徽州、秦州、凤州、巩昌、广州、永春、龙兴宁州等地先后爆发山崩，人畜死伤无数。而安庆、饶州、信州、京师、太湖、庐州、蕲州、黄州、顺州、龙庆州、保安州、密州、胶州、汉阳、蓟州、镇江、台州、蕻州、雷州等地遭受到的则是地震的破坏。地震发生时，崩城陷屋，巨大的破坏力伤及成千上万的百姓及禽畜。

当然，发生在14世纪的严重灾害不单是在中国的元朝，而是遍布世界各地，比如冰岛、英格兰以及日本，整个世界都在承受瘟疫、饥谨、农业减产和人口下降。而中国尤其严重，长达36年的时间里冬天都是严酷寒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严寒的记录。

可以说，天灾在元朝末代皇帝统治期间几乎年年都有记载，频繁的饥荒导致大量百姓饿死，而对灾民的拯救，又导致了元朝财政和经济的亏空。元朝经济垮了，政府的统治自然就削弱了，而且天灾人祸还迫使活不下去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在元朝建立不到百年的时间，农民起义的烽火始终没有熄灭过，而且愈演愈烈，直到元末以红巾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风暴把这极其野蛮的暴力统治彻底推翻。

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突然恶化曾经改变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或者说在改朝换代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像4世纪的西晋、12世纪的北宋、17世纪的大明，都曾因此而走向衰落，乃至覆亡。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都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而元朝末期，却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作，不能不说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是元朝灭亡的导火索。

2. 丞相造假钞与以钞买钞

元末曾广为流传一首无名氏的《正宫·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方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一曲《醉太



平》，唱出人间不平事。这首曲子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总结了元朝灭亡的原因。正如《辍耕录》所说的：“《醉太平》一阙，不知谁所作。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以其有关于世教也。”

所谓“堂堂”，是伟大，强大的意思。大元是对元朝的尊称，不过这都是反语。变钞，指的就是元代统治者滥发纸币，纸币经常贬值，兑换新币时，还要补收工本费。原钞本（纸币准备金）不许挪用，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皇室奢侈，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引起物价飞涨。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可见滥发纸币与元朝灭亡很有关系。



元代“至元通行宝钞”

元代统治者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财政规划，总是大把大把地赏赐，大把大把地花钱，钱花完了就发钞（纸钞），钞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就变更钞法，旧钞换新钞，中间再狠狠地掠夺一次。元代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变更了三次钞法。即使这样，统治者还是一直叫唤着没钱花。

元代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流通主要靠纸币。元代的纸币称为钞。忽必烈即位后，1261年颁行交钞，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錠）。同年10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钱一贯（一千文）同交钞一两。元朝灭宋后，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子和会子，统一了币制。原钞本（纸币准备金）本来是不准挪用的，纸钞的发行量也有严格限制。但自从阿合马等权臣掌权以后情形大变，开始把滥发钞币作为聚敛钱财、搜括财富的重要手段，对民众竭泽而渔。1276年以来，每年印发数由数十万飙升至一百九十万。中统钞贬值五倍以上，造成“物重钞轻，公私俱弊”的严重后果。

1287年桑哥受忽必烈之命理财，这时钞法虚溃，已成为元朝财政中的

十分尖锐突出的问题。而桑哥解决财政危急的方法，竟然是变更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1308年2月，中书省大臣曾经上书皇帝：“陛下登极以来，赐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预卖盐引。”又说：“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易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到1309年9月，已借支钞本至一千万锭以上。

一方面是大肆挪用钞本，造成物重钞轻，钞法大坏，另一方面则是在尚书省平章政事乐实的请求下，变更钞法，颁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罢废中统钞，限令各地在一百天内都到平准行用库进行倒换，同时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用于补国用不足。

1311年正月，又铸造铜钱流通。元朝建国后，本来是只造纸币的，武宗时新造的铜钱分“大元通宝”“至大通宝”两种。至大通宝一文合至大银钞一厘，大元通宝一文合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也都相参通用。铜钱发行后，又毁掉至元钞版，只用至大银钞与铜钱相互通用。

为什么统治者要屡屡变更钞法呢？其原因就在于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从元世祖以来，元朝政府财政日渐拮据，因此纸币发行量猛增，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大德以来，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年间，动用纸币准备金的情形更为严重，又发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大力整顿钞法，罢掉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4年每年印数都在200万锭以上，官定钞银的比值只及中统初的1/20。日积月累印发的纸币到至正年间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还伪钞横行。元代虽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如规定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造假者仍不在少数。历年印造的伪钞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正常的货币流通形成极大的破坏性。

末代皇帝顺帝时财政枯竭，1350年4月，左司都事武琪向丞相脱脱建议变更钞法，铸造铜钱，吏部尚书契哲笃对他的建议表示支持。为慎重起见，脱脱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压制了反对意见，决定变更钞法。